

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

冯希莹

摘要 卢梭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是理性的,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主张通过公众共同参政议政建构自由平等的社会。李普曼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产生于开放、互动的空间,容易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因而未必能够主导政府决策。这两种舆论观点为舆情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迄今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公众舆论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两种范式

一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诺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的考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使用了“公众舆论”(l'opinion publique)一词^①。卢梭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的表达,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共同的利益。公众通过持续地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意志得到彰显,最终实现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卢梭的公众舆论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舆论传播的学理意义,成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武器。

第一,卢梭舆论观的逻辑基础,即人类的理性足以产生理性的“公众意见”。其思想建构正值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提倡用理性武装人的头脑,“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作为启蒙运动时期最激进的思想家,卢梭主张人类首先是理性的,理性的个体必然产生理性的声音,卢梭将“公众”与“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大多数理性的个人所表达的见解

能够呈现理性的“公众意见”,由此形成了带有绝对理性主义色彩的公众舆论观。

第二,“公众意见”的目标是公民的公共福祉,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卢梭对此的阐述体现在他对“公意”与“众意”的区分上。在他看来,“公众意见”分为“公意”,即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总和;“众意”,即个人意志的总和。“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关注私人利益。即便存在“众意”,“公意”也总是处于常态,“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③。“众意”无法取代“公意”,这是因为,真正的“公意”从集体出发,适用于全体公民。这种力量难以被取代,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第三,“公众意见”具有法律及道德功能,公民服

① Vincent Price, *Public Opinion*, 邵志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48 页。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第 35 页。

从法律,就是服从公意。由于“公意”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因此,“公众意见”“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相对于成文的法律而言,“公众意见”可以不断获取新的力量,是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律^①。“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政府本身的团体意志应该是极其次要的”^②,这里公意处于主导。这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自己为自己立的法。“公众意见”不仅具有法律、道德功能,更以习惯性的力量代替了传统的权威力量。

总之,在卢梭看来,公众舆论是理性公正的,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因此理性的公众舆论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可以说,卢梭的思想超过了启蒙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然而,任何理论都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一百多年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转型,在此背景下,作为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对卢梭所提出的公众舆论思想进行了反思。

二 李普曼对“舆论”形成源头的重新解读构成了其公众舆论思想的基础。卢梭认为虽然“公众意见”是公众讨论的结果,但“意见”形成的源头却在于人类的头脑及其理性。对此,李普曼指出“舆论”存在的外在条件是社会的真实环境,之所以产生“舆论”是因为人们对真实环境抱有想象,并有所反应。他认为,“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③如果将“意见”和“公众意见”看作两个独立的步骤,那么卢梭眼中的“意见”是相对静态的,是人根据自身的理想产生的,而在李普曼建构的公众舆论思想中,“舆论”的形成源于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及互动。正是由于李普曼对“舆论”形成源头的探讨,人们才开始思考“公众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并重新审视影响“舆论”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李普曼指出,公众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形成理性的意见,这构成了其公众舆论思想的关键。在李普曼看来,人只有在了解了所生活的世界后,才能形成“意见”,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众几乎不可能形成卢梭眼中的理性意见。其中,客观因素包括:现有的审查与保密制度使公众与事件之间存在屏障;公众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特

别是政治事件的时间相对匮乏;受报道条件的限制,报道内容不得被压缩成简短的消息,因而可能造成对事件的歪曲报道或公众对事件的误解等。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获得的外界信息残缺不全,并影响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同时,公众在主观上具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公众认识世界的主观障碍。所谓“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持有固定的、简单的印象,并融入了相应的感情色彩,倾向于按照习惯理解新鲜事件。李普曼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④。因此公众可能未经思考,就已经对事件定了性。这与卢梭在“论社会状态”时所提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卢梭看来,社会人“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⑤。显然,卢梭忽略了影响公众舆论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而李普曼却恰恰从此入手,强调公众舆论是公众根据别人的报道和自己的想象拼合起来的,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特征。

此后,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是指公众受实际活动范围、精力的影响,只能通过传播媒介了解超出自身感知的事物,而传播媒介对信息的偏好及加工,使其在反映客观世界时产生偏移,为公众塑造了一种“拟态”的现实环境。因此,“公众舆论”不再是公众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供给的“拟态环境”的反应。李普曼一方面强调在现实社会中,公众依赖并且相信通过新闻报道可以间接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强调“拟态环境”作为现实社会的图像缩影,为公众提供相对简化的认知框架,只是公众形成意见的依据,由于“拟态环境”的存在,公众会轻易地受利益集团的诱导,主导政府决策的目标变得难以实现。

总之,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无法形成理性的舆论,更不能主导政府决策”。李普曼与卢梭观点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实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69~70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9页。

③ 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页。

④ 李普曼:《公众舆论》,第62页。

⑤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5页。

际上,他们都是在为资产阶级大造舆论,只不过卢梭的公众舆论观产生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壮大的时期,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观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影响了公众舆论的传播与形成。李普曼对卢梭公众舆论思想的反思,使西方公众舆论观向经验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三

如果说卢梭开创了公众舆论思想的先河,那么李普曼的研究则构成了公众舆论研究的拐点。因为,在李普曼之后,研究者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这种转变使得解释公众舆论的形成范式由“相对封闭”转向“开放互动”。

第一,公众舆论的形成环境从“相对封闭”向“开放互动”转变。在卢梭看来,“公众舆论”产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公众有目的地表达个人意见。由于个人的理性,公众可以判断出对社会有利的一面,个人意见并不需要激烈碰撞也能实现相互沟通。相比之下,“开放互动范式”强调人的交流与互动,突出“公众舆论”形成的日常化及非正式化。公众在表达个人意见的同时,也在听取他人的意见。社会为公众提供了交流的“公共场域”,此“公共场域”不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而大众媒体则充当了传播“个人”与“集体”意见的媒介,经其传播,“个人”与“集体”的意见变得界限模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由此形成了“开放互动范式”,拓展了“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舆论”的发声空间。

第二,公众作为舆论的主体从“绝对主体”向“主体与受体的集合”转变,这一转变使外界力量,尤其是大众媒体的重要作用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形成的作用”开始受到关注。在“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意味着“绝对主体”,究其原因在于卢梭对人类理性的假设。而在“开放互动范式”中公众则是“主体与受体”的集合,他们在交流与互动中一边接受信息,一边发出声音。公众作为舆论主体的转变对于进一步解释“公众舆论产生的源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李普曼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现代舆论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宣称公众自由言说意见的权利,而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舆论的形成中施加影响;不在于强调舆论崇高的社会立法和道德维系地位,而在于通过对舆论的研究观察其日常的社会

控制功能”^①。

第三,公众舆论的导向方式由“公众自己主导舆论”向“利用社会精英引导舆论”转变,这一转变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虽然在学理上尚未达成共识,但却启示人们,社会精英包括大众媒体应在引导公众舆论中承担重任。在“相对封闭范式”中,公众可凭借自己的力量主导舆论,进而影响政府行为。但李普曼从现实出发,指出公众影响政府行为的希望非常渺茫,因此提出由社会精英提供“有组织的情报”来引导舆论。他设想组织政治专家建立独立、专业的“情报收集机构”,它们拥有独立的财政以及不受限制的“接触事实材料”的权限,凭借技术专家的力量,使公众认识到隐藏的事实。但也有学者质疑,指出专门收集情报的专家也是社会人,他们同样也会受“刻板成见”的影响,同样生活在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中,他们究竟能否在现实中保持客观、理性,不受外界甚至利益集团的干扰,为公众描述真实的世界仍是个未知数。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提出“利用社会精英引导舆论”的现实价值,不在于社会精英是否能够完成引导舆论的任务,而在于社会精英有责任引导公众舆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网络舆情研究”(项目编号:10JJD71005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冯希莹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杨 好

^①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